

史沫特莱：用真实材料勾勒红色中华

□ 徐佳佳



1928年，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在5年多时间里，史沫特莱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偏见地报道中国。为了将中国红色革命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史沫特莱决心写下一本客观介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著作。

虽然史沫特莱非常想到江苏苏区实地采访毛泽东、朱德并亲身体验苏区的革命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严厉封锁，史沫特莱根本无法实现她的苏区采访计划。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国革命、苏区和工农红军的真实信息，史沫特莱开辟了多种“途径”。

和左翼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广交朋友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通过各种渠道，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宋庆龄、杨杏佛、邹韬奋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广交朋友。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史沫特莱了解了中国红军的建立、发展及苏维埃政权构建的大致情况。史沫特莱曾说：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故事就是通过鲁迅。

据史沫特莱回忆，1930年夏秋之交，她曾受左翼知识分子的委托，为鲁迅50岁生日庆祝会找一处场地。虽然知道要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多是被国民党政府密切监控的人物，但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和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同情，史沫特莱还是出面租到了一家餐厅。在这次聚会上，与会青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了解的共产党的情况详尽地告诉了史沫特莱，这些情况对她日后的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通过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引荐，史沫特莱还和一些拥有“红色背景”的进步人士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些人，如胡也频等还到瑞金参加过“一苏大会”，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并承担过培养与中央苏区秘密联络的工农通讯员的任务。

这些人的见闻，为史沫特莱书写中国红军和苏区的事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采访从苏区来的革命者

从1932年起，史沫特莱将自己的住所提供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利用其身份掩护了许多从苏区转移而来的革命者，并帮助他们隐蔽文件、寻找医药和其他物资，其间，请他们讲述苏区、工农红军的情况，“收获颇丰”。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11月陈赓到上海后，当地的地下工作者很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就对他们讲了很多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英勇斗争的事迹和自己所了解的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文化建设和战斗等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将陈赓的口述内容整理成文稿并委托冯雪峰转交给鲁迅，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以此作为素材写一些关于苏区的作品。史沫特莱得知后，主动约见陈赓，请他详细讲述自己在军队和苏区的见闻，并进行了认真的记录、整理。

深入工农群众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经常前往矿山、工厂，了解工农群众的真实生活，并通过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轨迹。她曾经采访过一位在湖南耒阳矿山工作的老矿工。这位老矿工告诉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7月到12月这里就有387名矿工惨遭杀害。他们赴刑场时，个个昂首阔步，面无惧色，一路高呼革命口号”。幸存下来的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南矿工游击队”，并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位老矿工也带着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向国民党军队开展斗争。“我的儿子带领矿工游击队到耒阳城和朱德部队会师，改编成立

红军第一旅，我儿子就当上旅长了。后来，为了建立红军兵工厂，我儿子从红军中抽调出来自广州的20名军火工人和将近一百名干过冶金、锻工、修补、制造枪炮的其他产业工人，创办红军第一个兵工厂。”史沫特莱将这些内容整理后写成了通讯《湖南的矿工起义》，并在此后的著作中多次加以引用。

“公开”资料和秘密“线人”

为了让材料尽可能全面、客观，史沫特莱特别聘请冯达等人作为自己的秘书，收集各种国民党当局的“公开”资料。据史沫特莱回忆，冯达的工作是：“把中文报纸上的消息剪下，译成英文，帮助我建立档案。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卡片就有几盒。”

在整理这些“公开”资料的过程中，史沫特莱很快发现了其中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如她在国民党当局的统计中发现：被国民党军消灭的红军人数半年里竟高达50万，但被红军夺取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国民党当局曾多次宣称朱德、毛泽东已被“击毙”，但没过多久却又在报纸上刊登“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的广告。因此，在选用这些资料时，史沫特莱非常谨慎，每一个材料都要经过多次调查、比对。

为了搜集材料，史沫特莱还在交往中认识了一些秘密“线人”，这些“线人”能够帮助她获得一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史沫特莱曾回忆，有一个德国飞行员，“他的消息来源非常有价值。他从内地各大城市回来，就把他拍摄的照片和得到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位德国飞行员曾经为她提供过“汉口江汉大楼前面空场上”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工人的照片。

再版与补录

在搜集、整理了大量准确、客观的材料后，1933年5月，史沫特莱前往苏联，并用10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终于完成了记录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的《中国的红色风暴》一书。

《中国的红色风暴》于1934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1936年，史沫特莱在再版中增加了大量关于苏区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将书更名为《中国红军在前进》。

再版时新增的内容主要来自1934年到1936年期间史沫特莱对大量苏区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其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史沫特莱对“李工程师”和周建屏的采访内容。

1933年春“李工程师”就见过史沫特莱。初次见面时他还委托史沫特莱“帮助自己前往北平，以便他参加东北义勇军”。1935年春，返回上海的史沫特莱与“李工程师”再次巧遇。在这次会面中，“李工程师”向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长征的传奇经历。史沫特莱回忆，“李工程师”在瑞金附近的红军工厂担任负责工作，因为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很少的缘故，工作需要他干什么他都自己动手干，从制造枪炮弹药、战争物资到红军医院筹建制药厂、肥皂厂、军事他都在行。“李工程师”向史沫特莱讲述的中央苏区情况非常具体，“包括江西中央苏区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医疗卫生、教育法制、行政问题、矿藏资源、农副产品、书刊报纸等等都谈到了”，同时还为史沫特莱讲述了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斗。

相比于“李工程师”着重对中央苏区的描绘，周建屏的讲述为史沫特莱了解赣东北苏区提供了丰富素材。1935年6月，周建屏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到上海医治。其间，他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并经胡风与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为确保疗养期间的安全，党组织安排他到位于公共租界的史沫特莱寓所居住。在两个月的疗养过程中，史沫特莱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

史沫特莱的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翔实的内容、生动细腻的语言及“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这部著作不仅让世界拥有了一个了解真实中国的机会，也深深地影响了众多中外青年的人生道路。

（摘自2023年1月5日《人民政协报》）

齐白石与年画

□ 郑学富

中国古代，将正月初一称为“岁朝”。文人们在此日喜欢将鲜花、蔬果、文玩供于案前，以求春意盎然、新年好运，被称为“岁朝清供”。但是，当时能在隆冬时节摆上鲜花、果蔬之类的鲜物者毕竟是少数，于是文人们便将这些“清供”之物绘成画悬挂室内，称为“岁朝图”，成为祈福纳祥的“年画”。此类画作通常以静物画的面貌出现，采用的画法也是写生技法，形象逼真，内容也是以冬天不易看到的花卉、果蔬为主，有的还配以贺岁诗词，通过画中物品的名称谐音、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来表现一个美好的新年祝福。这本是文人玩的一种雅事，宋徽宗赵佶尤爱为之，将其传入宫中。到了清代，宫廷中大行其道，每逢新春，御用画师们要按时呈献“岁朝图”，以供宫室春节点缀之需。擅长绘画的皇亲贵胄、朝廷官员们也以这种形式向皇帝恭贺新禧，甚至皇帝本人也亲绘“岁朝图”，表达新年的喜悦和祝福。到了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等绘画大师们将“岁朝图”生活化、世俗化，融入鞭炮、红灯笼等“俗物”，使其成为民众百姓喜闻乐见的“年画”。

齐白石出生于农家，早年干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他的绘画来源于

生活，植根于民间，将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艺术情趣融入文人画中，由“大俗”到“大雅”。所以他的画更接地气，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烂漫的童心。他笔下的“岁朝图”增添了泥土味和民俗特色，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画面以“中国红”为主色调，赋色上鲜艳泼辣，多用洋红，明快浑厚，突出中国传统的喜庆气氛，热烈、祥和、欢快。在所画内容上除了代表吉祥富贵的玉兰、牡丹、海棠等花卉外，还加入了红灯笼、红柿子、红对联、红鞭炮、酒壶、酒杯等民间用品，表示大年新春的到来。所画之物造型简练质朴，用笔老辣拙趣，用墨酣畅淋漓，追求色彩饱满、炽烈，画面效果夸张、鲜活，将民间艺术与文人画有机融合，摆脱了古代文人孤芳自赏的“清雅”模式，把“雅”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在构图上新奇而不落窠臼，营造出温馨欢乐的生活情趣，雅俗共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80多岁的齐白石“胸中一口闷气，长长地松了出来”，他又恢复卖画刻印，琉璃厂一带画店又挂出了齐白石的润格。同年10月10日，孙连仲将军在北京受降，又有朋友来访，留家小酌，齐白石心花怒放，乘兴作七言

律诗一首：“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劳樽前鼓似雷；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他像过年那样还画了一幅《岁朝图》。图中的大红宫灯和鞭炮是喜庆用物，寓意喜气洋洋、喜气盈门；兰花瓶中插着一朵盛开的硕大的牡丹，代表着和平的到来、平安富贵；四个红红的柿子寓意事事如意、事事大吉；酒壶、酒杯是说胜利来之不易，值得饮酒庆贺。内容丰富，构图精巧，清新秀丽。白石老人凭借自己高超的笔情墨韵，以独特的经历、性格、感觉、趣味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笔墨语言，赋予作品质朴而热情的生命力。

齐白石一生画了很多“岁朝图”，但题款“新喜”者甚寡，他93岁时画了一幅名曰《新喜》的画。新喜又作“新禧”，为一年之始，即过春节，人们互祝新年幸福。此画构图平实，一个普通的花瓶中插着几枝怒放的红梅，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作为传春报喜、吉庆的象征，从古至今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吉祥之物，梅花的五片花瓣喻指“五福”。五个红彤彤的柿子，看似随意排列，实则错落有致。花瓶寓意“平安”，柿子寓意“事事”，红梅寓意“喜庆”，三件物品组合于一画之内，有“事事平安喜庆”

吉祥之意。花瓶旁摆着一把酒壶，其上有朵朵祥云和飞翔的龙，两只酒杯在红柿两侧，一挂赭褐色的鞭炮，斜斜指向画面左下角，增添了节日气氛，令人想起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诗句。这幅《新喜》图，花瓶、梅枝、酒壶、酒杯与鞭炮均用粗笔勾勒，梅花瓣与柿子则为没骨法，两种画法结合巧妙，使线条与块面、色彩与水墨、骨力与韵致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新喜》作于1953年。这年1月7日，北京文艺界专门为齐白石召开祝寿大会，文化部授予齐白石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称号。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晚间的庆祝宴会，对这位画坛耆宿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所以《新喜》既是对新年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以此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和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

（摘自2023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甘祖昌，1905年生，江西省莲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井冈山起步，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数次负伤。龚全珍，1923年生，山东烟台人，甘祖昌之妻。

1957年，甘祖昌因公受伤，伤愈后谢绝组织安排，带领全家老少回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当农民。他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回乡后，甘祖昌带领坊楼群众开沟排水、兴建水库。当时，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生活上十分节俭，却把2/3的工资用来修水利、建校舍、扶贫济困。他参与建起了3座水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

1985年，甘祖昌旧病复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派人来慰问，提出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说：“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逝世，终年81岁。

龚全珍与甘祖昌相濡以沫几十年，龚全珍也将自己全部的爱和热情投入到这片红色的土地，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教书育

甘祖昌龚全珍：扎根农村一心为民

□ 郑少忠

人。2003年，离开教育岗位的龚全珍，加入了莲花县县镇两级的老干部宣讲团。“我始终坚信，跟着共产党走人生才有意义，我也有决心跟党走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龚全珍这样阐述自己的初心。

（摘自202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桃岭战斗

□ 张瑞安 段良润

红25军长征后，为了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35年2月，以红82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28军，下辖第82师第244团（3个战斗营、1个特务营）及军属手枪团（3个分队），共1400余人。

红28军的重建使蒋介石极为震怒，他严令所谓的“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在3个月内剿灭红28军。红28军采取游击战术，飘忽不定，多次瓦解国民党军进剿。4月中旬，红28军进至潜山、霍山、舒城边界活动。国民党军第32师第95旅第190团邀功心切，衔尾紧追。为打破敌人追剿计划，红28军决心诱敌深入，寻机歼敌。

4月20日14时，红28军特务营营长林维先率部登上桃岭，敌第190团尾随至桃岭西南5公里处的岳西县池畈村。桃岭山高坡陡，树林茂密，坳口西侧为伏龙寨，东侧是赵胡尖，中间是通往山岭的崎岖小路。山路右侧是悬崖峭壁，左侧是深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很适合打伏击战。

根据敌军骄狂的心理，红28军决心在桃岭设伏歼敌，并在伏龙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对作战任务和战法进行研究部署。会议决定由特务营占领坳口及两侧高地，佯败诱敌进山并正面阻敌，扼守山口；第244团和手枪团埋伏在坳口西南侧山背后鞍部。待敌进入设伏地域，主力部队迅速出击，采取堵头截尾、拦腰斩断的战法，将敌围歼在坳口南侧山坡及桃岭冲一带。

任务下达后，参战部队克服连续行军征战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准备。林维先令特务营第1连扼守坳口。第2连第1排占领坳口东侧高地，第2、第3排隐蔽在西侧高地。第3连为营预备

队，在坳口隐蔽待命。随后，红28军立即抢修工事，构筑阵地，密切注视敌军行动。第244团和手枪团进入预定位置，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军指挥所设在伏龙寨南侧。

16时30分，国民党军第95旅第190团第1、第2营不等后续部队到来，便以三角队形向桃岭发起猛烈进攻。当敌人进入坳口接近我军前哨阵地时，林维先一声令下，特务营居高临下突然开火，将敌人压制在山坡上。但国民党军第190团以为这是一支红军小股部队，抵抗一阵就会撤退，于是以更加密集队形向坳口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特务营接连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这时，敌人慌忙调整战术，先用炮火轰击，接着发起又一轮进攻，并以后续兵力一部迂回至坳口东侧高地，侧击特务营。在特务营面临被夹击的危险时，林维先挥舞大刀，率部与敌展开肉搏战。

此时，第82师第244团和手枪团沿桃岭西北侧山凹部，向敌侧后迂回，将其分割成数段，随后发起猛烈进攻。同时，他们以一部兵力穿插至桃岭西南侧，切断敌第1、第2营退路。

红28军主力投入战斗后，战场态势发生了变化。林维先率全营趁机动向敌发起反击，除后续部队逃脱外，敌第190团全部被歼。待敌第192团得知消息赶来增援时，红28军已撤出战斗，安全转移至马家畈。

桃岭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28军的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处于艰难中的红28军士气。

（摘自2023年2月19日《解放军报》）